

## [Special Contributions]

# A Literary Force Worth a Thousand Soldiers: An Interview with Liang Jun

<sup>1</sup>WANG Zuyou <sup>2</sup>LIANG Jun

<sup>1</sup>Taizhou University, China;

<sup>2</sup>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Received: January 8, 2026

Accepted: March 15, 2026

Published: June 30,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WANG Zuyou & LIANG Jun. (2026). A Literary Force Worth a Thousand Soldiers: An Interview with Liang Ju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 (2), 001 – 007, DOI: 10. 53789/j. 1653 – 0465. 2026. 0602. 00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2.001>

**Abstract:** It is a writer's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document unique life experiences and resonate with like-minded readers. Liang Jun writes when he is deeply moved and after careful reflection. This creative approach is evident in works such as *Daomadan*, as well as the novels *Migration Agent* and *Chasing Dreams in Sydney*. His fluent prose and subtle dry humor are vividly displayed in his essay collection *Sydney Capriccio*, which offers readers a sense of emotional release. Although Australia is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a “glass ceiling”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still persists. The generational gap within Chinese Australian artistic communities is also quite pronounced. Consequentl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ustralian literature has faced considerable challenges.

**Keywords:** dry humor; *Migration Agent*; *Chasing Dreams in Sydney*; *Daomadan*; *Sydney Capriccio*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WANG Zuyou, male, professor, he earned his Doctor of Literature degree from Xiamen University in 2006,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essor Yang Renjing, a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Hemingway scholar. His primary research areas are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He has published 18 academic works and nearly a hundred papers in scholarly journals such as *Foreign Literature*. He has completed 7 research projects. His *Collected Poems of Wang Zuyou* (2025) has been collect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 His email is wangzuyou2012@163.com. LIANG Jun, originally from Guangdong, China, was born in Tianjin and currently resides in Sydney, Australia. He serves as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New South Wales. His published works include: *Chasing Dreams in Sydney*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the first novel in the “Immigrant Life Trilogy,” winner of the Novel Award at the 2nd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Awards, *Migration Agent* (Australian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the second novel in the trilogy, supported by a publication grant from the Nanming Foundation of Australia, *Daomadan* (Australian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a collection of novellas and short stories as part of the trilogy, winner of the Novella and Short Story Award at the 5th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Awards, and *Reflections in Sydney* (Australian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 文學良將抵千軍

## ——梁軍訪談錄

<sup>1</sup>王祖友 <sup>2</sup>梁軍

<sup>1</sup>泰州學院；<sup>2</sup>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華文作家協會

**摘要：**作家把自己經歷的不一樣的人生記錄下來，與同頻的人產生共振共情，是一種社會責任。他的文學故事就是內心有觸動、沉澱之後翻騰出來去寫的，如：《刀馬旦》，長篇小說《移民代理》和《悉尼追夢錄》更是這樣。梁軍流暢文風和冷幽默在隨筆集《悉尼隨想》中四處可見。讀罷讓人精神上的焦慮頓時釋放。澳洲雖是多元文化社會，但種族歧視的『玻璃天花板』是存在的。華人藝術家社團的斷檔情況也較為嚴重。澳華文學的發展並非坦途。

**關鍵詞：**冷幽默；《移民代理》；《悉尼追夢錄》；《刀馬旦》；《悉尼隨想》

王祖友：梁軍先生好！首先，對您的中短篇小說集《刀馬旦》剛剛獲得『第五屆世界華人文學獎·中短篇小說獎』表示熱烈祝賀！

梁軍：謝謝王教授！

王祖友：記得您有一部長篇小說也獲得過世界華人文學獎？

梁軍：2023年，我的長篇小說《悉尼追夢錄》獲得過『第二屆世界華人文學獎·小說獎』。

王祖友：您發來的電子書大致看完，隨筆集《悉尼隨想》的流暢文風和冷幽默令人叫絕，您的文風是如何養成的？與移民身份有關係嗎？

梁軍：我是天津人。文風這種東西往往是天生為主，後天養成為輔。與移民身份有點關係。身在海外，說話不用顧忌太多。我多次在各類研討會說，大家要維護珍惜自由寬鬆的創作環境，多出作品。

王祖友：『拔牙』（《悉尼隨想》362）一文，也是叫人忍俊不住，這樣場景在澳洲多嗎？

梁軍：幾乎天天發生。常事兒。

王祖友：那住澳洲，和在德雲社等地一樣喜樂多多？

梁軍：平心而論，沒有。澳洲是旅遊觀光勝地，真正討生活，尤其作為第一代移民，壓力很大。當然，也看個人心態。我們寫作的人就是要在光怪陸離的繁榮背後、瑣碎的日常和生活壓力當中發現被遮蔽甚至被扭曲了的人性本真。

王祖友：這是發揮藝術的娛樂和教育作用？

梁軍：至少我不這麼認為，寫作不能總想著教育別人。同頻的人也許能產生共振共情。用修行人的話說，得看緣分，把我們自己經歷的不一樣的人生記錄下來，指不定碰上哪個有緣人，能從中獲得讓我自己都意想不到的積極收效，客觀結果上，這也能算作一種社會責任吧。

王祖友：老舍的《我怎樣寫小說》主張：小說是對人生的解釋，只有這解釋才能使小說成為社會的指導者。也只有這解釋才能把小說從低級趣味中解救出來。所謂《黑幕大觀》一類的東西，其目的只在揭發醜惡，而並沒有抓住醜惡的成因，雖能使讀者快意一時，但未必不發生世事原來如此，大可一笑置之的犬儒態

度。更要不得的是那類嫖經賭術的東西，作者只在嫖賭中有些經驗，並沒有從這些經驗中去追求更深的意義，所以他們的文字只導淫勸賭，而絕對不會使人崇高。所以我說，我們應先選取平凡的故事，因為這足以使我們對事事注意，而養成對事事都探求其隱藏著的真理的習慣。有了這個習慣，我們既可以不愁沒有東西好寫，而且可以免除了低級趣味。客觀事實只是事實，其本身並不就是小說，詳密的觀察了那些事實，而後加以主觀的判斷，才是我們對人生的解釋，才是我們對社會的指導，才是小說。

您認為老舍的小說創作論有當代價值嗎？

梁軍：老舍先生這段話我覺得大致方向是不錯的，比如他說的『應選取平凡的故事……』這一段。

『小人物』的喜怒哀樂最能體現一個時代一個族群的本真。聖童博士是獨立學者，他在談『關於寫作問題』的時候就特別強調過作者接受現實世界『投喂』的重要性。『投喂』是AI用語，他借助這個術語形象地刻畫了寫作者與現實世界之間的倫理關係。把這個『投喂』行為上升為一個寫作上的『視閾投喂理論』，你接受的『投喂』視閾有多寬多廣，你寫作上所能關照到的方圓也就會有多大。他還給出了寫作上的第二步理論，叫『塔式認知層級理論』，說白了，你站在一層樓的話，就不可能認知到站在十層樓上的人所見識到的東西。現在網上流行的一句話說得比較好玩兒，『允許青蛙做青蛙』。但這恐怕只說了一半兒，還要『允許航海者去踏上他們的「巨鯨之路」』。海外的華文文學創作其實比較清晰地體現了這個『投喂』下的認知提升過程。初級階段免不了寫一些文化衝突，新移民的悲催，時間久了，特別是隨著對生活的深入，就會逐漸意識到還有不同種族文化融合的問題，人性的衝突問題，等等。大面兒上看，人就是人，誰也不比誰高尚，誰也不比誰卑微。但隨著『認知層級』的提升，你就會在這些平常的人事當中發現更深層、更本質的東西。而寫作者的這種認知提升就會直接影響閱讀者的體驗，他們再看你所給出的人物性格、人物關係、矛盾衝突，甚至對你語言的品味，都會有所改變。這不僅是小說的魅力，更是所有寫作所彰顯出的魅力。讀者和時間最有發言權。

另外，古希臘的犬儒主義(Cynicism)，本義是主張摒棄世俗的欲望、財富和權力，遵循自然的生活，追求內心的美好，是對一種道家式的德行的一種強調。老舍先生所使用的『犬儒』觀，應該是十九世紀被變種了之後傳入的帶有明確貶損意義的『犬儒』。

王祖友：《刀馬旦》中徐衛國的故事很令人尷尬：『徐衛國堅守自己的道德底線，卻無法守住愛情，無法和寶貝女兒朝夕相處享受天倫之樂』（《刀馬旦》201），這個人物有現實生活原型吧？他和妻弟爭執的愛國問題、各執一詞，似乎都有道理？

梁軍：您聖明。尷尬的的確不是徐衛國本人，而應該是他周圍的這些『我們』。這就是我身邊朋友的事兒。他故去了，我才寫。他到臨終之前，生活習慣和價值觀都沒變，還是一個好兵。我寫他的時候，雖然盡力保持0°C的客觀，但我心裏，還是靠近他的。

各人身處不同的時代、種族、文化背景和社會階層，對相同的問題一定有不同的答案。這就是『塔式認知層級』下的差距。

其實，這個故事只是他人生的前半段，後半段我沒寫。

王祖友：後面的沒寫是有什麼特別原委？

梁軍：他後來回悉尼生活，做政府工，因對職場霸凌和對亞裔的不公正待遇不滿，把所在的政府部門告上法庭，幾年無果，後患肺癌，鬱鬱而終。

他的追悼會是我寫的悼詞。後來，他的親姐姐把悼詞給在國內外的親戚朋友看，說給了他最好的人生總結。

王祖友：他離婚之後先回到中國，然後為何又重返澳洲？再次回到澳洲，他是一個人生活的？

梁軍：他的父母是高幹，可能他已經不適應國內的人際關係了。出國沒有回頭路。後半段兒他擔保了一個國內來的女人，又生了孩子。

王祖友:徐衛國原型就是 A 先生? 他最終不是『贏得了法庭的和解判決』(《刀馬旦》209)?

梁軍:是。他曾經跟我說,最難受的時候,是看到和澳洲白人前妻生的大女兒,耽誤學習照顧伺候後爸和她親媽生的幾個弟弟妹妹。做父親的,見不得自己的孩子寄人籬下,舔犢之情。這種人生況味,唉!

所謂和解只是賠了一點錢,工作、前途、健康,甚至於人生都毀了。我曾經勸他,去開大巴,怎麼不是活著。但他要的是政府部門道歉,讓他回去工作,得到該得到的工作職位。

王祖友:就是說正義最終缺席,個體還是輸給了州政府所表達的『群體』?

梁軍:當然,意料之中。少數族裔、移民,常常會遇到這種情況。

王祖友:這是非常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事件,您能詳細談談嗎?

梁軍:小說嘛,就像我們寫劇本,總要有一個來源,真實的事件和人物,要他們這麼一個核兒——人物的一個原型。作為小說和劇本,你肯定要給它增加很多的情節和人設,但是這個事兒和人物是真實的,不能憑空捏造。

至於國外的種族歧視,其實很平常。像美國,前幾年有一個獲第 91 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原創劇本的電影《綠皮書》,講的是一個黑人音樂家的遭遇,故事背景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黑人音樂家要去南方,種族隔離還非常嚴重的地區,去巡迴演出。他要請個司機兼保鏢,找了個白人。編劇把黑人和白人兩個人物換了一下位置。這就有意思了,有看點。

白人助理帶著黑人老闆在南方旅行演出,遭到了很多歧視,這都是真事兒。最終,倆人成為朋友,達成了不同種族間的和解。

促成大的政策的改變一定是從小人物間的故事開始。

澳洲這個國家,過去,有一個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 澳大利亞聯邦在 1901 年至 1973 年間實行的反亞洲移民的種族主義政策的通稱,該政策歧視亞洲人)。現在,白澳政策廢除了,社會進步了,大家對這個問題也有了更加理性的認識。而且,移民越來越多。二戰後,歐洲的移民來的很多,像英國人、義大利人,然後就是越南難民,黎巴嫩難民。到了 90 年代呢,就是大量的中國留學生,還有印度和其他亞洲國家的留學生,然後,技術移民越來越多,大部分是亞裔,還有就是一些商業移民。這些移民的人口數量越來越大,就要求社會要有一個相對公平的環境,所以情況在一點點改變。但是,在一些看不見的地方,還是有一些種族歧視的情況。有個英文詞叫『玻璃天花板』。打開電視,你看聯邦政府的議會開辯論會,幾乎都是白人,當地的土著人——原居民的代表,成為聯邦議員的,人數也非常少,亞裔的更少,這些年也就幾個亞裔,而且都做不長。其實呢,我們中國人在澳洲有 150 萬了,兩千六百萬的澳洲人口總數中,這個比例已經很高了,但是我們在政治上還是相對弱一點兒。

所以,你作為一個亞裔,在公司裏邊兒,難免會遇到歧視的情況。我這個朋友 A 先生,他碰到什麼情況?他所在的政府部門,當時有一個高級職位的空缺,大家可以申請,要考試。結果,他幾次申請幾次考試都通過了,就是被拒。這就是歧視。理由不說,盡在不言中。

所以作為移民來說,要慢慢地被這個新的國家接受,民主政治要一點點的改善。作為新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他們同化以後,就叫 banana,香蕉人兒,外皮兒是黃的,但是芯兒是白的了。同化以後,他們就沒有隔閡了,也會被當地人完全接受,他們變成了當地人,但是需要時間。有的時候可能兩三代人吧。我們的下一代好很多。

王祖友:少數族裔的文化藝術,比如:華裔作家的創作,也會受到歧視嗎?

梁軍:我沒有看到少數族裔畫家、作家、藝術家創作被歧視的事件。但是,因為你不是主流文化,不是電視、報紙或者政府對外的公開場合能夠出現的一種文化,對吧? 那麼就被忽視。你就是不能發聲,或者你發聲了,沒人聽。你只能在你的小圈子裏搞一搞,不能說是他們的歧視,但這是一個現狀。你像今早您給我發

信息的時候，我正在參加我們作協作家的一個新書發佈會。我是新州華文作協的副會長嘛，我們作協 70 多位作家，每年總有各種由頭，新書發佈會、研討會、讀書會，我組織的比較多，所以我今天就去了。像這種新書發佈會，自己在幾個華人文學群發一發消息，圖書館借個地方，招呼幾十個人來一熱鬧，再在華文媒體發幾篇新聞稿，就是這樣。能說是主流歧視你嗎？也不是。只不過你沒有進入到人家的那個圈子裏。

我也跟朋友一塊兒玩影視。去年我們拍了個短片，在國際上幾個電影節都獲獎了。美國休斯頓電影節拿金獎。我們那個片子，跟我合作那個朋友，他自己掏錢，到藍山那兒去拍了三天。另外的朋友把自個兒的院子借出來，自己租挖掘機挖戰壕，吃住什麼的都是那個朋友自掏腰包，就是這麼一個狀態。你搞文化，沒人給你喝彩，沒人給你投資，沒人給你站臺，就靠你們自己個兒，不忘初心，慢慢兒地鼓搗這個東西。

拿悉尼來說，華人藝術家社團很多，有畫畫兒的，有詩詞的，有作協，有音樂的，有戲曲的，有跳舞的，反正什麼都有，中國老年人玩的社團，這兒都有。但是呢，其中一個現象就是參加這種文化活動的人年齡都偏大，都是退休以後跟著孩子從中國出來的，或者是在這兒退休以後參加這些社團，新一代斷檔還是比較嚴重。

我們作協來說，我 50 多歲了，算年輕的，平均都 60、70 歲了。我們一直想招新人加入作協。當然我們是有門檻兒的，就是你必須有作品，或者獲過獎，光愛好不行，這個標準定的不是很高，是吧？都是業餘寫作，還能怎麼樣呢？只要你寫，堅持華語創作。但是即使是這樣，沒有年輕人加入，三四十歲的也鳳毛麟角，這就是文化傳承的一個現實。我想其他國家和地區，美國、歐洲，情況也大抵如此。

**王祖友：**在澳大利亞這樣的民主國家，人民和政府也有矛盾的吧？

**梁軍：**在澳洲，人民和政府間的矛盾總是有，它本身就是一對兒矛盾體，就跟婆婆和兒媳婦兒似的，是吧？全世界這一對兒都是矛盾體。雖然澳洲政府是民選，但一個政府不可能所有的政策，尤其是國內有關民生的政策，得到所有選民的支持。但它一定要顧及大多數人的利益。這個利益包括你的工作權力、社會福利、住房、醫療、教育，市政建設，等等，這些是政府一定要考慮的。但沒有一個政府，即使它自認為是最好的政策，能夠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像前兩年疫情的時候，澳洲就跟英、美學。看著英美，英美幹什麼它就幹什麼，人家封城它就封，人家打疫苗它也打疫苗，人家開放它也馬上跟著開放，這就是澳洲這個國家的政治常態。人民呢，有的時候，普通的老百姓好像不太能夠談論政府的政策對於個人的影響。除非養老金多了少了，買房的印花稅賣房的增值稅多了少了，除非這個直接能感受到的，其他他們不關心的。

澳洲的政府是分級的，聯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聯邦就是中央政府，坎培拉管外交，國防，各州政府間的資金分配，管大事兒。第二級州政府就相當於咱們的省政府。州政府自己管教育，醫療，市政建設，等等。第三級政府就是 Council，相當於中國的區政府吧，管當地的衛生，環境，管這些東西。

所以老百姓可能對區政府，當地政府或者是州政府的一些政策可能會有一些看法，但是上升到國家層面的，大部分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了。各人自掃門前雪，哪管別人瓦上霜，愛怎麼著怎麼著。是這種心態，不太關心政治。

但是呢，由於澳洲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移民來自於 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所以，比如說：聯邦層面的外交政策，可能會使一部分國民對這個比較關注。前幾年，自由黨聯邦政府，莫里森政府，對中國不太友好，華人就覺得很憋屈，民間對政府的批評聲很大，針對這個外交問題的。

因為中國是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最大的旅遊遊客的來源國，留學生人數第一的來源國。說白了，中國是澳洲的金主，資源出口基本上都是到中國。你跟金主就是要保持一個友好姿態，相互尊重，別嘴裏沒把門兒的。現在這一屆政府，工黨對這個問題有所調整，跟中國的關係慢慢調回去——友好了，互利了，所以我們華人社區，至少這 100 多萬華人對這個問題就沒有什麼批評的聲音，都是贊同的聲音。

**王祖友：**用您小說中的一句話，作家的創作可以這樣描述——『所有的不經意，都是在潛意識裏精心籌畫過的』（《刀馬旦》81）。您的小說創作也是這樣的吧？可以結合您的移民生活三部曲談談嗎？



梁軍：咱們聊天說這些創作的時候，當然好像很隨意，看什麼寫什麼，實際上真不是那麼回事兒。因為，第一，您對國外生活也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因為您做研究，經常跑，聊的人也多。其實，國外生活很簡單、重複，它不像中國過去幾十年改革開放的時候，人民天天向上，社會天天有新鮮事兒出來，你會感到生活很有動力。國外不是這樣的。生活很平緩，人容易停滯，容易懶惰。文青們好像對寫作的興趣不是很大。我一般寫故事的話，尤其是小說、微小說，都是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沉澱。比如說，我看到一個人一件事兒，我不會馬上寫，都是攔了很長時間在心裏，然後偶然間還總想起它，我覺得這個事兒就是真的對你內心有觸動，然後我把它再翻騰出來，再去寫的，我一般都是這樣的，長篇更是這樣。《移民代理》和《悉尼追夢錄》，是我前幾年出版的，一個是百花文藝出版社，一個是澳華文學出版社。這兩個長篇呢，幾乎是我前20年在澳洲生活的一個縮影，很多人生活的一個概括，它不是我自己的。因為，首先，我當年做過幾年移民代理，做了很多的case，有好多的人和事兒，對我觸動很大，因為我們每個人生活的環境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當我看到很多非常不同的人生故事的時候，對我是一種觸動。當時我就經常想這些人和事兒。幾年後，不做代理了，我還會經常回憶起這些人和事兒，找不到其他解脫的辦法，後來我就乾脆把它寫出來。當然，背景、人物的真實姓名等都需要模糊掉，這樣才好一點兒。寫完以後，精神上的那種焦慮好像一下子就釋放出來了，就沒有，就不想這些人和事兒了，就把生活這一頁和這些人翻篇兒了，釋懷了。嗯，我想這也是我們意識不到的寫作的一個功效吧。

《移民代理》中，我設計了很多人物，其中很多人物就是我們生活中的人，天津人，北京人，上海人，廣東人，福建人，東北人……這些不同地方的人，來到悉尼以後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有自己的道兒，我就把比較典型的這個謀生的手段部分摘了出來，然後把他們的語言提煉，把它們的人物關係架構好。所以呢，這部長篇是介於虛構文學和非虛構文學中間的一部小說。

當時我是按照劇本寫的。影視文學劇本兒，情景喜劇，在喜劇風格的框架下敘述一段沉重的生活經歷，把生活重壓下釋放出來的人性善惡美醜這一沉重的話題轉化為群眾喜聞樂見的表現形式。這是我的嘗試。

《悉尼追夢錄》講述了四個華人移民家庭和周圍人所經歷的生老病死悲歡離合。

這兩個長篇，在海外華人移民的生活軌跡中，表現了不同的階段性。《移民代理》就是我們準備出國啊，剛剛出國，人生地不熟，對於外國的生活文化，還有憧憬和嚮往，是這個狀態的時候。《悉尼追夢錄》是這些人到了這個陌生的國家這個城市開始生活以後，他們的狀態，不是一個人的生存狀態，是一群人的生存狀態，群像。這個階段的『視閥投喂』還只是停留在有限的範圍之內的。

而我最近出的這個《刀馬旦》就明顯不同了，它不是只寫我們海外華人在國外生活的狀態，還寫了很多當地澳洲人的日常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就是說我們長期在這兒，安身立命以後，20年以後，我們對這個新的國家，對它的人民，對它的文化有了更新的更深刻的認識。從我們的這個新的認識的角度和眼光去看這個國家，慢慢地不自覺地被它所影響，被它的文化所薰陶同化，最終成為他們中的一部分，身不由己。

國際新移民華文作家筆會會長張奧烈先生給《刀馬旦》寫的序，是一篇專業、精準且富有文學溫度的導讀。

它比喻精妙，結構清晰，以『三道式西餐』比喻小說集三個板塊（微型、中短篇、劇本），既貼合書中『華洋交集』的內容底色，又讓讀者對全書結構一目了然，是一個極具巧思的破題。它抓住本質，提煉精準，敏銳地指出了從『生存實錄』到『精神洗禮』的躍升，並點出在地書寫的核心——『講好澳洲的故事』。尤其對『二十年』時間跨度的強調，揭示了從『新移民』心態向『世界公民』視角轉變的關鍵。

序言沒有停留在技巧分析，而是上升到價值層面——指出這本書的超越性在於『站在世界公民的角度，為人類而表達』。這一判斷拔高了整本書的立意，也為海外華文文學的價值提供了有力的辯護。他寫的時候，沒跟我交流過任何觀點，大概一個月寫出來，但是他所寫的真正是我心中所想。

聖童博士在我這部小說的發佈會上的發言，則從他的中國哲學範式的詩學理論立場做出了我『敘事』行為的『詩意性』分析。他發言的題目就是『梁軍文學敘事的詩意性分析』。從理論和哲學思辨角度，把我的『敘事』行為提到了一種『意象』的高度，這一點很奇妙，完全不同於以往的小說分析。以往人們對小說的『敘事』，基本是從故事本身的內容以及內涵出發，認為作者寫的故事或者講的故事，就是作者所要表達的目標內容了。聖童博士不這麼看，他把我寫的或講的『故事』只是當成一個『意象材料』，他在看這些『意象材料』的時候只是把它們當成了我寫作目標的一個載體，而我真正想要表達的目標內容並不是這些故事本身，而是這些故事背後所隱含的生命本質的價值意義。他甚至認為唐代僧侶詩人賈島的絕句『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直接就理解為『敘事』，他的這個比方可能就一下子讓人明白了他所謂的小說寫作的『意象材料』說法的實質。這還不是最叫人稱奇的，最叫人稱奇的是，他認為小說一旦以『意象材料』的立場寫『故事』，那麼作品的結果往往就能夠呈現出詩歌形式所擁有的『詩意』。這個『詩意』不是別的什麼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就是老子『大道』恒定不改的那個屬性『善』。

聖童博士的這個理論，當時讓很多聽眾打了一個『激靈』，旋即又覺得他說得沒錯。對我而言同樣如此，因為我覺得我們寫作要表達的就是這個善意、善念的『善』，老子說的那個『上善若水』的『善』，這個『善』既然在『萬物之中』，也就當仁不讓地為我們『人』所擁有。咱們人性當中的這種寬容、互相支持啊，包容啊，愛呀，就是這個『善』的具體體現。我們中華民族的子孫走到海外以後，支撐我們度過各種難關的精神支柱，就是我們民族刻在骨子裏的幾千年形成的這種往往表現為內斂、堅毅、不屈、公正等等的『善』的精神，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發酵。在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這個叫做『善』的東西就會表現出來。

這麼多年，我周圍朋友只有一個心理產生了問題，他自殺了。其他幾乎所有的家庭都是和睦的，沒有離婚的。孩子都不錯，都成才，上大學，有很好的工作，進入政府部門。我們年過半百，都在工作，尤其是太太們，提出特殊表揚，婦女能頂半邊天。我們用自己的雙手在異國他鄉重建生活。至少我周圍的人是這樣兒的。

所以我覺得這三部小說，從時間線上，反映了海外移民二三十年間的人生的一個歷程。從人性上，表現了人性的不同與趨同。不一定全面，也不一定準確，但它是我眼中的這些人和事兒，我眼中的世界，每個人看世界的角度不一樣，是吧？ 嗯。那我只能說我認識到的這個世界。

**王祖友：**隨筆集《悉尼隨想》中，您希望：希望政府別再擠兌老百姓，讓大家喘口氣兒，休養生息，把利息降下來。稅收嘛，盯著點國際大公司，他們的外國股東賺得盆滿鉢滿，給澳洲交了多少稅？資本家吃肉，得給老百姓留口湯。治大國若烹小鮮，水至清則無魚。各行各業要摒棄『一切向錢看』，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悉尼隨想》371）您認為這樣的理想國什麼時候或者條件下才能出現？

**梁軍：**哈哈，您聖明。資本主義國家，國家的政策都要保護偏向大企業和資本，如果能夠兼顧保障普通百姓的低稅收，教育，醫療，養老，已經阿彌陀佛了。澳洲的社會現實就是大家都向錢看，每個行業都把客人當成待宰羔羊，包括政府。目前，老百姓的生活負擔很重。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相比十年前，市政管理費上漲 61%。種族問題在移民國家，如美、加、澳、新會長期存在。這些都給我們寫小說的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素材。

**王祖友：**願生活明天更美好！

**梁軍：**謝謝王教授！